

“以苏为鉴”：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彭波 郑德荣

摘要：苏联模式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却实现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在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并在此后带领全国人民对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向“左”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目的并未根本达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桎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以苏为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逻辑起点

苏联模式曾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消除了限制社会主义各国独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禁锢。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夕明确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强调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以中共八大为历史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虽然这些探索实践在随后几年逐渐偏离正轨，但对于改革开放后我国最终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提出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建设模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产生过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经验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初更是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以苏为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在“以苏为师”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创造，在政治上建立起了有别于苏联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特征研究”（编号：14BKS025）成果。

〔收稿日期〕2015-10-10

〔作者简介〕彭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4

郑德荣，东北师范大学荣誉（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24

商制度；在经济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思想文化上树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体制，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上述制度和体制的建立，为此后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进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此同时，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由“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根本性转变。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揭露了苏联模式在建设社会主义上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为各国跳出传统社会主义思维桎梏，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契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更引以为戒。”⁽²⁾“以苏为鉴”的提出，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更多地注重在理论和实践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力争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重要指导思想的转变，与党中央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和对我国“一五”建设经验的总结密不可分。

通过数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实践，党和政府在取得经验的同时，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端有了初步、客观的认识。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出发，对苏联模式的弊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批评。经济方面，毛泽东认为，苏联高度集中、颇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以下弊端：第一，农轻重三者比例严重失衡。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过于偏重重工业发展，忽视了农业与轻工业，造成三者发展比例严重失衡，使得国内食物短缺、物资供应紧张。第二，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关系处理不当。毛泽东指出，苏联所采取的义务交售制等剪刀差政策，对农业剩余过度抽取，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特别是中央过度集权，导致地方发展积极性受挫。毛泽东认为，集权管理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夯实国家建设的物质基础，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但是，过于强调集权则无法发挥地方生产的积极性，使地方不敢对经济建设提出意见。政治方面，毛泽东认为，苏联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存在以下缺点：第一，中央集权过多，束缚了地方的手脚。他指出：中央过度集权将降低地方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³⁾第二，苏联的一党制使得苏共“一言堂”现象严重。毛泽东

指出，苏联式的一党制将使国家无法听到不同的声音“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⁴⁾第三，民主法制不健全使得苏联出现了个人崇拜，并导致了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事件的发生。而在思想文化方面，毛泽东认为，苏联的文化发展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其教条化的发展体制不允许言论自由，使得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自由名存实亡。

而在国内，“一五”计划在提前完成并取得显著成绩之外，也暴露出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存在的问题。第一，产业结构，特别是农轻重发展比例，已出现失衡迹象，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从1949年到1955年，尽管新中国的农、轻、重发展均有增长，但工业增长却达到了农业的五倍之多。第二，国防工业和工业建设的关系出现问题。受国际冷战环境影响，我国的建设规划重心不可避免地倾斜于国防工业建设，各类生产要素无法满足农业、轻工业发展所需。同时，国防工业发展的过大规模又导致工业建设的全面紧张。第三，农业生产上出现了上级部门铺派各种非生产性事业等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自身积累和发展的现象。第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的独立性不足使得其生产积极性降低。对于这些凸显的问题，毛泽东深切感到“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而之”⁽⁵⁾，如果不分利弊而学习，中国将重蹈苏联的覆辙。这一担忧引发了他更为深层次的思考。终于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并且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上走出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

二、“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 and 局限

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最先从经济领域着手，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提出了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目标，并初步形成了以下几点思想：第一，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工农业并举方针。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⁶⁾他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肯定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战略考量，但这绝非意味着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所谓并举，并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必要时可做适当倾斜，达到综合平衡。第二，在对国际局势持谨慎乐观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

展内地工业”这一工业布局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二五”期间要适当放慢国防工业步子，腾出更多资金用于经济建设。第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向地方分权来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充分发挥地方在经济建设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中央和地方相互促进，既能统筹全局，也能兼顾局部问题，关心群众实际利益。第四，以统筹兼顾的方针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第五，将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中，并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允许少量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继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设想后，毛泽东更是进一步提出“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命题。他强调：商品生产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加以利用。这些思考尽管不甚完善，但毕竟标志着我国在中国式工业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取得了初步成果，为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政治方面，苏共二十大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走出一条“以苏为鉴”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必须在我国的政治发展中形成有领导的自由、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中国政治民主有序发展。对此探索的经验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毛泽东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指出：认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后整个社会就不会存在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真想法，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且“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的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⁷⁾他进一步明确强调，这一基本矛盾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实现调节并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此，中共八大对我国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决定将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使中国尽快地由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与发达两个阶段。这一论断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第二，扩大民主，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弊端。苏联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人民民主专政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权力的集中极易使执政党忽视民主，走向极端。要克服这一弊端，就必须扩大民主。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鼓励民主党派“唱对台戏”，以改进党的领导，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

党在国家体制上也提出两项措施：一是积极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二是试行行政体制改革，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力，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实行相互监督。党的八大在党的体制上也做出两项改革：一是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二是设立中央书记处，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以加强集体领导，以避免苏联式的个人专制出现。

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出了新形势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针对我国当时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使用不当等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是爱国的，对于他们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毛泽东更是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号召全党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些讲话极大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使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兴起。第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针对苏联以行政干预科学艺术发展的弊端，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不仅要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更要有辩论的自由，不能用一种学术压倒一切，唯有如此，学术才能迅速发展。他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⁸⁾“双百”方针的提出，使我国的科学文化发展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树立了比苏联更为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大期间明确提出“以苏为鉴”，并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领域入手，对“第二次结合”进行了大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探索并未坚持下来，已经取得的一些认识在党的八大之后或发生动摇，或被直接否定。这一变化的产生同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局限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中国共产党虽在党的八大期间提出“以苏为鉴”，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提出了一些正确、精辟的观点，但这些观点绝大多数是对苏联模式的弊端进行修补，而非根本性的变革。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建设原则相同，苏联模式仅仅是在方法上有所弊端。以苏联为鉴戒，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对这

些弊端的纠正，而非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如在经济方面，毛泽东虽提出要利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但他对于价值规律的强调并未跳出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他强调，价值规律“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⁹⁾这表明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在形式上可以有区别，在内容上亦可有所不同。这一点直接导致了“以苏为鉴”在总体上无法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甚至某些探索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完善这一模式。

其次，受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和国内一些地方少数人闹事的刺激，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继而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一判断导致了我国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重心逐渐偏向于阶级斗争。而在经济建设上，刚从革命年代走来，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仍习惯于用革命年代“大兵团作战”、“群众运动”等战斗性思维对待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崭新课题。于是，在迅速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急切心态驱使下，党意图用群众运动这一老办法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了“大跃进”的失误。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对“大跃进”的深刻反思和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新的认识。然而，这些正确的认识尚未充分展开，便很快被中苏论战打断。在中苏关系全面破裂的过程中，毛泽东虽然仍然强调“以苏为鉴”，但已与党的八大不同。这时的“以苏为鉴”，主旨是为了“反修防修”，避免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我国仍然在寻求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探索的重心已发生了偏移，由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期的错误。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鉴”，实现“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终究没能在这一时期完成。

三、改革开放后继续“以苏为鉴”， 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期间提出“以苏为鉴”的批判精神、探索精神，坚持八大的正确政治路线，纠正了1956年以后我国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错误，继续以苏为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这

一世纪命题。邓小平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已经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但并未妥善解决，相反，却陷入了苏联模式的桎梏。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明确的认识。而要真正实现“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科学、明确的认识，才能为开辟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在坚持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国走出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科学依据。此外，邓小平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他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¹⁰⁾经过数年的深入思考与不懈探索，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思维的桎梏，强调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邓小平同时强调，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建设必然会走向僵化，这也是苏联模式失败的内在原因。中国共产党人若要走出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就必须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旧有的体制、机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跳出苏联模式的桎梏，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第二次伟大结合。

在经济方面，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不断凸显，若再不对这一陈旧体制进行彻底革新，它终究会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推力变为阻力。因此，必须摒弃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思维，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闯出一条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应当简单地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划归为社会制度范畴，而应仅仅将其视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他在党的八大的认识基础上更进一步，突破将经济活动手段和管理体制划归社会制度范畴的禁锢，破天荒地在南方谈话中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¹¹⁾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我国走出了一条对内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

不断实现全方位、多层次、跨领域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政治民主建设方面，邓小平重拾党的八大所提出的扩大民主这一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幕。他强调，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12]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缺少民主的政治体制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会阻碍科学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更会导致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的滋生蔓延。长此以往，我国将无法保持稳定的社会局面，现代化建设也将无从谈起。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同时，邓小平又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划定了必须坚守的几条准则，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则在于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党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就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接受群众监督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此后，邓小平把建立人民监督制度作为发展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突破口，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成为今天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文化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重申了党发展文化事业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确立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强调，要走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符的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向；必须坚决执行“双百”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方针；必须切实尊重并发挥文化工作者的主体作用，使文化事业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解决自身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破除以往一味采取行政手段干预的痼疾；必须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大胆借鉴、吸收国内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实现包括文化发展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大胆吸收国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带领我国走出了一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源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这条道路，一方面反映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建设。

总的来说，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的伟大探索，尽管没有取得成功，但仍然具有不可否认的深远历史意义。这次探索，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博采众长，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从本民族特点出发，确立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正是在对这些探索的继承和发展中，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继续“以苏为鉴”，开辟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3]可以说，“以苏为鉴”的提出，当之无愧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起点。

参考文献：

- (1) [3] [8] 逢先知.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2卷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557, 540, 570-571.
- (2) [4] [5] [6] [7]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6. 23, 34, 366, 240-241, 214.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 1998. 35.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编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65.
- (11) [12] [13]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3. 373, 372-373, 300.

(责任编辑: 王云川)